

自序・我的第一課

我在大學念戲劇，幸運地獲得多項獎學金，到日、英、德、美等國研修。後當上自由身的舞台劇導演，非常藝術，本性自然唾棄一切與金錢有關的事，連電影也嫌市儈商業。我們那個年頭，全職的話劇團仍未成型，演藝學院是未來的夢，於是個人職業前途未卜，但我們未嘗氣餒，從不擔心。

曾經接受報章訪問，刊出時標題竟是《不賺錢的兒童劇導演》。母親讀了，沒有作聲。

1985年，有一個簡單的夢：藝術不應有界限，為甚麼傷殘人士就不可以是主角？

遇上香港藝術中心主管Nicholas James，他十分贊同，鼓勵我串連藝術界與復康界作出突破。他給我一張書桌、一個電話、一張名片，但沒有薪酬。「你先做一個可行性研究。證明可行，便再着手令它成功，最後便可領取你應得的薪酬。」

我一口答應，非常雀躍。

跟着幾個月忙於拜訪復康界、藝術界、教育界和政府部門，學了許多，得到許多啓發、許多鼓勵。但答案通常是：「我們非常欣賞這個方向，也非常贊同這會是很有意義的突破，但礙於我們架構所限，只能有限度參與，不能牽頭。我們也沒有資源可以調用在這個新方向。」

我卻不明白，為甚麼大家都認同的熱切理想，卻不能實現呢？

請教復康界之父的方心讓教授，他先告訴我現在的潮流是「融合」，他也認同結合藝術，將為復康事業闖出新天。他鼓勵我「想得大一點」，所以亞洲首屆的「展能藝術節」(Festival of Arts with the Disabled) 構思出爐了。

有了計劃，便去找資源。區議會說，如果證明有社會資助，他們便會配對。於是我們也去找商業贊助。但主意在當年算太新穎了。有些說他們只慣贊助復康事務，有些只支持教育或藝術，現在這個構思跨界別，「兩頭不到岸」。這窘境，英文叫catch 22。

一晃眼九個月。我母親見女兒天天出門上班，九個月來卻從未拿薪酬回家，她也有點焦急。母親努力掩飾焦慮，不給我過大壓力。

我是初生之犢未懂畏虎，只奇怪為甚麼人人都贊好的主意，卻不能實現？我沒有放棄，但藝術中心的Nicholas 卻板着臉跟我說：「已經這麼多月了。如果真的找不着贊助，證明時機仍未成熟，你便要取消計劃，告訴所有人，事情要告一段落。你就當作做了一個實驗，一個藝術研究好了。」他給我再一個月的期限。

奇蹟出現了。

Citibank（當年叫「萬國寶通銀行」）答應贊助30萬元。

機器可以開動了！復康界、藝術界、教育界的幾十個伙伴欣喜若狂！區議會的撥款也隨即落實。其他大大小小有形無形的支持也陸續湧至。

展能藝術節，是大家的夢想，是當年劃時代的創舉。「藝術同參與、傷健共展能」，囊括了戲劇、舞蹈、視覺藝術、社區藝術等的精英領導，一起以平等關愛擁抱世界、打破藩籬。當時的《南華早報》便讚許這是「一個關愛社會的開始」。而我也在努力10個月後，終於可以第一次、也一次過全數支取10個月的工資。

1986年4月，藝術節過後，有30萬盈餘，於是成立了永久性的「香港展能藝術」。廿多年後，在歷屆主席和委員會的領導下，這個小小的非政府組織，在社會上穩佔一個席位，發展至近30名職員，每年要籌約300萬作經費。

展能藝術節是我籌款的第一課。

自此，我便不再害怕籌款。為實現夢想，籌款只是其中一個步驟，其中一塊基石。

我也是近十年才留意到，美國大學早已設有慈善事業研究中心。著作、博士論文固然多如牛毛，而籌款科也設碩士學位。

我更是最近才知道，20年前我被羅致入港大，負責籌劃八十周年慶典時，也是十分險。原來那時，也有大學管理層認為我的出身太雜，作為大學行政人員，不甚正統，只是得當時的港大新聞處主任徐天佑先生力保。（我申請扶輪社獎學金往美國紐約大學攻讀戲劇時，徐天佑是面試小組一員，因而認識。）

人生就是這麼回事——還不是緣、義、情，才譜成了這本小書。